

文化长江巴渝风

绕过磐溪，20世纪中国美术史就会支离破碎

□韩毅

立足重庆美术馆，远眺两江交汇，水天一色，泼墨成画。

新年伊始，重庆画院建院40周年作品展正在这里举行，展览汇集晏济元、冯建吴、张民权、苏葆桢、牛文、江碧波、罗中立、侯宝川等110位艺术家的113件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等多个类别，蕴含了重庆画坛的历史文脉、文化记忆和精神归属，彰显着深厚底蕴，标记了传承坚守和情感沉淀。

在长江文化的滋养下，从唐宋时期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赵孟頫的《江山万里图》到明清时期谢时臣的《巫峡云涛图》、佚名的《长江万里图》；从抗战时期张大千的《嘉陵江图》、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到解放后李可染的《夕阳中的重庆山城》、钱松喦的《红岩》；从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江碧波和叶毓山的《红岩魂》到新时期庞茂琨的《辉煌九龙》、焦兴涛的《烈焰青春》……“中国美术重镇”重庆墨韵悠长，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辉煌。

山水入画

石窟艺术代表世界最高水平

群峰耸立，白云萦绕，路径隐显，栈道危架，一行人马从山间穿出，皆着唐装……完整钩沉重庆美术史的《巴山渝水入画图》主编黄伟介绍，唐代李昭道的传世名作《明皇幸蜀图》（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知名度高且时间较早的将长江上游巴蜀地区入画的现存名画。

“在《明皇幸蜀图》中，李昭道描绘了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入蜀的故事。画中的山石勾皴、林木轮廓，用线勾勒而无皴法，设色用青绿，是反映唐代山水画面貌的重要作品。画中还乾隆皇帝的题诗，足见其珍贵！”黄伟称。

山水画自古是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上游雄浑壮美，天生佳景，千姿百态，是历代文人墨客情有独钟的“写生”之地，留下了不少杰作。如，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宋代夏圭的《长江万里图》，波涛汹涌，雄伟险峻；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明代吴伟的《长江万里图》，江上风帆，云山壮丽；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的清代王翬的《长江万里图》，山间栈道连连，江上帆樯如林……此外，还有美国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藏的北宋李公麟的《蜀川胜概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南宋赵孟頫的《江山万里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的明代仇英的《蜀川佳丽图》，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的明代谢时臣的《巫峡云涛图》、清代袁耀的《蜀栈行旅图》等。

黄伟称，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还记载，唐明皇诏吴道子、李思训写生嘉陵山水，回京后同画嘉陵江三百

里风光于长安兴庆宫大同殿壁，李思训累月方毕，吴道子一日而就。玄宗感叹：“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

到明清时，以龚晴皋以及破山、竹禅等为代表的巴渝书画艺术家，融合诸家，自成一格，独步风骚。尤其是龚晴皋，吸纳石涛、八大山人、傅山等艺术思想，诗书画贯通，碑帖交融，笔墨纵横恣肆，朴拙高逸，为巴渝艺术的发展增添了新的风姿。

“除了国画外，就雕塑艺术而言，重庆目前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规模宏大，造像精美，兼具北方石窟的丰满厚重和南方石刻的生动细腻，代表了公元9—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成就了重庆在中国艺术史上首个高峰。”黄伟说。

高师云集

“黑院墙”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摇篮

《群奔》《群牛》《巴之贫妇图》《国殇》……走进徐悲鸿美术馆（重庆），“大奇至美”徐悲鸿经典作品展正在展出。该展览用22幅珍贵原作，生动再现了一代工匠的文人气节、家国情怀和时代理想，也梳理出徐悲鸿在重庆的历史印记。

“这是重庆美术史上又一个高光时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美术家协会主席、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美术学院也内迁重庆，随之而来的各流派艺术家为重庆艺术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其中，当时中国最专业、档次最高的美术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天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迁至重庆磐溪（今盘溪）后，租赁郭家院子为校舍。为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艺专师生们用锅烟墨将外墙抹黑。由此，“黑院墙”逐渐成为国立艺专的代名词。

虽然时值战火纷飞年代，“黑院墙”里却是高师云集，人才辈出。丰子恺在此完成《护生画集》第三集部分画稿；李可染创作了《执扇仕女》《放鹤亭》等知名画作。此外，陈之佛、李超哉、傅抱石、赵无极等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也曾在国立艺专工作或任教。“黑院墙”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艺术大师潘天寿曾说：“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绕过国立艺专就黯然失色，而绕过磐溪就定然会支离破碎。”

同样内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还云集了黄君璧、张大千、陈之佛、张书游、谢稚柳、吕斯百、吴作人等杰出艺术家，培养了大批现实主义画家。如，吴作人在此期间创作了《重庆大轰炸》《空袭下的母亲》《不死的城》等作品；李斛将中国画的写意与徐悲鸿的写实结合，推进了人物画的创新；宗其香以贵州土纸，

用中国笔墨绘“重庆夜景”，徐悲鸿称其突破古人表现方法，为中国画的创举。

传薪惟艺

重庆美术再造一个又一个辉煌

“抗战时期，中国主要高等美术学院、美术团体，以及一大批中国美术精英汇集山城，造就了重庆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辉煌。抗战胜利后，内迁的高校、社团和大多数艺术家先后离开重庆，留给这座城市的却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奠定了重庆现代美术发展的基础，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庆美术的新纪元，并至今续写着辉煌。”著名美术史论家、四川美术学院中国抗战美术研究中心主任凌承纬称。

在凌承纬看来，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重庆美术发展史上出现过3次高峰：上世纪50年代的版画、60年代的雕塑、80年代的油画，重庆美术在中国画坛上异军突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少言、牛文、林军、吕琳等一批来自晋绥解放区的版画家来到重庆，推动了重庆现代版画发展。而李焕民、宋广训、吴凡、徐匡、吴强年、江碧波等一批从艺术院校毕业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美术青年先后加入，使得重庆版画家群体不但规模壮大，且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升。

此间，重庆版画群体在全国率先实施集体创作的方式，创造出了以《红岩》为代表的一系列组画形式的版画作品，影响全国。重庆版画以连续在第五届、第六届全国美展上摘金夺银的成就，把中国黑白木刻艺术推向历史的高峰。

上世纪60年代，四川雕塑异军突起，当时四川雕塑家的代表人物集中在四川美术学院，包括郭琪祥、叶毓山、伍明万、龙德辉、王官乙、赵树同等。最有影响的作品就是《收租院》，其借鉴西方超级写实主义艺术的手法，用造型艺术的形式作叙事性的表述，开创了中国现代雕塑群雕创作的先河。

到上世纪80年代，重庆油画被推向中国现代油画艺术的顶峰。1980年末，罗中立的《父亲》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荣获金奖，罗中立连同《父亲》几乎在一夜之间为全国人民所知晓。

鉴于四川美院油画创作的杰出成就和影响，1982年1月，中国美术馆邀请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作品展赴京展出，魏传义的《春晖》、张方震的《同甘共苦》、夏培耀的《金花》、王大同的《渔家女》、罗中立的《春蚕》等80余件油画作品参展。这些作品或以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或以淳朴浓郁的乡土情意让观众感动。参展作品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让中国美术界的权威们吃惊。中国美术馆特地为这

次展览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与会学者第一次提出了“四川画派”的概念。

上世纪80年代后，庞茂琨、张杰、翁凯旋、李强、杨述、罗发辉等川美油画家日渐活跃。如，庞茂琨的《苹果熟了》、张杰的《遥远的星》、翁凯旋的《老城》、李强的《古老的歌》等一批作品，在全国美术界影响深远。

2019年9月，重庆迎来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种类最多、影响最强的美术盛会——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油画、雕塑两个展区的展览。这不仅在全国美展举办70年来首次走进重庆，也是全国美术界对重庆美术近年来取得成绩的认同。在本届展览上，川美艺术家焦兴涛的雕塑作品《烈焰青春》获金奖，李震的雕塑作品《为新中国雕塑》、杨世斌的油画作品《家庭系列之花样年华》获得铜奖。

融入血脉

提升城市的“颜值”和“气质”

如今，行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重庆长江大桥的《春夏秋冬》、歌乐山的《歌乐山烈士纪念碑》、曾家岩的《周恩来》、南山公园的《大金鹰》、大田湾体育馆的《贺龙与运动员》、解放碑八一路好吃街的《重庆女孩》《吃火锅》、杨家坪步行街的《塑料袋》……一件件艺术作品已融入这座城市血脉，成为文化符号和城市记忆。

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也已从纪念性、抒情象征的主题，转向了城市景观、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以一种更灵活、更丰富的方式进入街道、社区和广场，走进人们的生活，提升着城市的“颜值”和“气质”。

不仅如此，重庆美术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原·美术馆、金山意库·轻艺术空间、龙美术馆（重庆馆）、徐悲鸿美术馆（重庆）等大量美术馆犹如珍珠一样，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融展示展览、艺术收藏、艺术教育、文化交流等于一体，提升着城市的品质和公众的艺术涵养。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正在加紧建设中，其立足“美术半岛”发展定位，突出生态、历史、人文、艺术特色，以艺术赋能长江之滨，发扬艺术文化，营造艺术家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除了城市，在武隆懒坝，法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的心跳博物馆、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月球博物馆、日本艺术家浅井裕介的苔藓馆、日本艺术家松本秋则的竹音剧院、丹麦艺术家托马斯·丹博的《爱的小径》；在酉阳叠石花谷，焦兴涛的《沟通之介》、傅中望的《斗笠》、刘佳的《对话》；在荣昌安富，徐洋和贺紫瑶的《契约剧场》、王国亮的《生命—陶的旅程》、刘天冬的《咕噜噜赶海》……一件件精

美的艺术作品被置于绿水青山间、村庄农舍旁，艺术融入乡村、融入农民的生活，探索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弘扬长江文化，扎根巴渝大地，紧扣时代之弦，重庆美术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有温度、有情怀的艺术作品，热忱描绘时代恢宏气象，正续写着“中国美术重镇”的辉煌。



▲“大奇至美”徐悲鸿经典作品展正在徐悲鸿美术馆（重庆）展出。受访者供图

重报艺术志



徐蓓

人物名片

徐蓓，纪录片导演，长期从事纪录片创作，早期有社会现实类作品《陈晓梅进城》《春秋》《进城》，纪录剧情片《迷徒》等。2012年开始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代表作《大后方》《西南联大》《城门几丈高》获得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奖、广州纪录片节“金红棉”等大奖。2021年，她荣获第十一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特别贡献奖，创作的纪录电影《九零后》获得第三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扫一扫 就看到

徐蓓：做一个纯粹的创作者

□刘一叶

2021年，对于重庆导演徐蓓来说是繁忙的一年。

12月30日，第三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举行颁奖典礼，由她执导的纪录电影《九零后》获最佳纪录片奖。而在此前一天，徐蓓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特别贡献奖。

学院奖评委会认为她的作品取材立足西南，视野却穿越历史，开阔深邃。在喧嚣的时代中，她保持纯粹，以女性的细腻和知性，探索人文和人性；在浩瀚的历史里，她执着发掘最新文献和研究成果，以学者式的素养，为作品注入严谨工整，而又不失灵性的气质。

从纪录片《大后方》到《城门几丈高》，再到纪录电影《九零后》站上金鸡奖的领奖舞台，徐蓓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如何看待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未来？近日，笔者与徐蓓展开了对话。

很庆幸，还没拍过让自己后悔的作品

笔者：“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特别贡献奖对你的颁奖词里提到了“纯粹”这个词，你也在获奖感言中说，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创作者。那么，你如何看待“纯粹”？

徐蓓：我觉得纯粹它是有前提的。纯粹，具体到专业来讲，首先要确定自己喜欢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纯粹”，比如《九零后》里的学者们，他们一生都在为一个目标努力，有喜欢翻译的，或者搞科学研究的，为了他们心中热爱的那个点在努力，我认为这就是纯粹。而对于我来说，我心中的“纯粹”就是在每一个作品里，付出自己的全部——热情、创造性、能力，还有诚意。

笔者：这么多年的创作，有拍过让自己后悔的作品吗？

徐蓓：我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我的心

之所向。我希望我的影片说真话，不虚张声势，不猎奇，打动自己的同时也打动别人。现在回头去看，即使最初的制作显得有些稚嫩，但很庆幸，我还没有拍过让自己后悔的作品，还是会感觉它们很真诚、纯粹，甚至会为它们感动。

笔者：有人认为《九零后》既有女性的细腻和知性，又总有一种让人震撼的宏大感，对此你怎么看？

徐蓓：作为一个女性，对情感的感受通常更细腻一些。但是，我觉得女性光有细腻的表达是不够的，它一定要跟宏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结合起来，三者的叠加就会显得特别有力量，会使你的片子有一种不同的气质。

关于视野的宏阔与思想的深度，我想，这与我剑桥大学进行社会人类学的学习密不可分。从此之后，我对每一个纪录片选题都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会尽力让内容从空间与时间上尽情伸展。我希望观众一方面能感受到支撑影片思想和情感是浩瀚而博大的，但是他们具体触摸到的永远都是丰富的细腻的细节，这些细节可以让他们被内容吸引的同时，去佐证这些思考。

以学者的严谨要求自己，才能担当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摆渡人

笔者：在拍摄《大后方》之前，你一直致力于社会现实题材的拍摄，近几年为何又将视角转向了历史题材纪录片？

徐蓓：1995年，我开始从事纪录片拍摄工作。入行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这些纪录片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记录着这些变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希望工程”，到三峡移民，到城市化进程，我曾用《陈晓梅进城》《细细的小雨》《进城》等纪录片记录下那时社会浪潮之中的普通人。事实上，正是那段时间，重庆的纪录片队伍开始壮大，时有佳作出现，比如王影导演的《巴人之谜》、雷卫导演的

《见证三峡》和《远祖之谜》，曾磊和杨芸导演的《纤夫老李》和《旅馆》，这些作品奠定了重庆作为纪录片大市的地位。

在拍摄社会纪实类作品以外，我也在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尤其是从剑桥回来以后。我从小便对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读过的书中，历史书的占比最大。2012年深耕，受市委宣传部邀约，我们开始筹拍《大后方》。当时我对历史知识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在周勇、李继锋等专家的指点下，集全团队之力完成了这部作品，并从此喜欢上历史题材纪录片。这一定是基于对历史、对纪录片的一种纯粹的爱。

笔者：从《大后方》《西南联大》《城门几丈高》，到如今正在拍摄的系列纪录片《卢作孚》，你一直在历史题材纪录片深耕，并且获得了众多可喜的成绩。这些成功的背后有何技巧？

徐蓓：把握这类题材的关键在于对历史的积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大后方》是我首次接触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也正是因为这部片子让我找到了一个自己擅长且喜欢的领域。然而，拍摄历史题材纪录片对于创作者的要求颇高，首先要查阅大量的史料。其次在文稿创作中，要以学者的严谨态度要求自己，无论做任何选题都要有广泛的学术支撑，才能建构起对事物的全方位了解。除此之外，对于缺乏历史影像资料等问题，拍摄团队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弥补。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创作团队才能将其融会贯通，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担当起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摆渡人角色。

对社会历史的深度思考、解读和反思，是纪录片最有价值的

笔者：如今信息传播媒介的改变，无疑对纪录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近几年，有不少年轻人爱上这种艺术形式，在你看来这是为何？

徐蓓：我们现在是一个视频类型极其丰富的时代，如果要我给出一个观众选择看纪录片

的理由，我觉得是因为两个字：真实。对比其他的影像艺术，在制作上，我们的确没有电影、电视剧那么华丽精致；在传播效果上，没有短视频那样丰富灵活。但纪录片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以真实为依据的，我们的每一个人物是真实的。真实就是纪录片的生命力所在。

与此同时，纪录片充满着哲思。它就像一双眼睛，通过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然后产生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度思考、解读和反思，这是纪录片最有价值的价值。

笔者：当下的纪录片新作层出不穷，但真正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凤毛麟角。对此你如何看待？

徐蓓：在《九零后》路演时，有很多青年学生告诉我，说自己喜欢看纪录片。每当听到这些温馨的话，我的内心是很受鼓舞的。目前，中国纪录片发展势头良好，各地都在创造条件，鼓励支持纪录片创作。比如重庆不仅在政策面上对纪录片导演给予了相关扶持，还挂牌成立了重庆纪录片产业基地，促进纪录片全产业链均衡发展。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纪录片来说，我们面临着人才结构的问题，我们缺少的是讲好故事的人。一个成熟的纪录片导演需要至少10年的成长期，年轻导演还需要下大工夫来提高自己的底蕴跟积累。这就要求他们要做一个纯粹的创作者，必须付出持续的、认真的投入和毫无保留的努力。

制作纪录片既要有细腻的表达，更要有广阔的视角和深刻的思想，从而突破自我的拘囿，去激发出故事背后真诚的力量。我相信有了这些阅历和锻炼后，人才储备也会越来越多，相信我们会找到一条适合纪录片市场的发展之路。

最后，我想谈谈我们正在创作的新作——5集系列纪录片《卢作孚》。这又是一个令人敬畏的选题，因为卢作孚是不少重庆人心中特别值得纪念、今天谈到他依然会被感动的人物。当然，除了追思和感动外，我们还要在片子中提出我们的思考：当年卢作孚为什么会做出那么了不起的事业？对于今天的人们，这些又有怎样的启发？相信你会在《卢作孚》里见到一个你可能从来不会这么了解的卢作孚。